

# 才子佳人小说的精神分析解读

张淑贤

摘要：流行于中国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在中国文坛上是一种颇受争议的文学形式。但佛罗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却为我们分析这类文学作品找到了一个新的思路，并看到了在平淡的作品背后作者并不平淡的内心世界。依照佛罗伊德的理论对这类作品进行层层观照会发现：作为落第的文人作者，其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种种梦想，及这中梦想在当时的文化含义。

关键词：才子佳人小说 精神分析 白日梦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被广泛地应用于文学批评，成为二十世纪一个重要的批评流派。当然精神分析学说在分析文学文本的时候，出现了不少荒诞百出的生搬硬套，譬如有的学者以为中国古代诗歌中的蜡烛都是“男性的象征”等等。但是，精神分析学说也确实为文学批评带来了一种新的研究视野。

这种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可以从两个方面的批评成果看出来。第一，是弗洛伊德及其门徒对世界上第一流的文学文本的分析，他们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看出了观众潜藏着的“杀父妻母”情结，弗洛伊德后来把少年人潜意识中的“杀父妻母”情结直接叫做“俄狄浦斯情结”，并认为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中，都隐含着“俄狄浦斯情结”。<sup>①</sup>然而，弗洛伊德及其门徒仅仅对这些伟大作品的极少部分进行了解读，而大部分伟大作品是难以用这种分析范畴进行硬套的。第二，在弗洛伊德看来，儿童时期表达愿望的游戏活动，后来被成年人的“白日梦”所代替，而这种“白日梦”在一些通俗作家那里表现得很充分，这些通俗作家往往杜撰作品中的人物，人物的愿望尤其是其爱恋女性的愿望很容易就得以实现，而且往往是几个女子争爱这个主人公，可以说，在作品中表现的实际上是意识结构中的“本我”(id)在艺术创造中的升华，所以这类文学作品往往能够获得很多的读者，成为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畅销书。也成为读者消解被压抑的情绪，暂时忘却自我，使情绪上得以快乐的源泉。

但是，精神分析学说对于这两类文学文本的分析之间，却没有沟通的桥梁。人们普遍认为，第一类文本是伟大的作品，这类作品的大多数并不适合进行精神分析的批评；而第二类文本虽然获得一般大众的认同，却并不为专业文学批评家所看好，但是这类文本却很符合精神分析批评的运用<sup>②</sup>。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无疑是属于后一类文学文本，虽然才子佳人小说流传到西方之后，得到了著名文豪歌德的高度评价，但是在中国国内，从古代到现代，评价都不很高。但是才子佳人小说并没有受到艺术评价高低的影响，仍然是大量地出现，因为它们有相当多的读者，甚至贬低才子佳人小说的现代文豪鲁迅，其母亲也是一个才子佳人小说的热衷的读者，鲁迅在贬低这类小说的时候为了讨母亲的喜欢还锐意搜求这类小说。

弗洛伊德说：“在艺术活动中，精神分析学一再把行为看作是想要缓解不满足的愿望——这首先体现在创造性艺术家本人身上，继而体现在听众和观众身上。”<sup>③</sup>当

<sup>①</sup> 详见《弗洛伊德论美文选》中《〈俄狄浦斯王〉与〈哈姆雷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等文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

<sup>②</sup> 参见弗洛伊德《作家与白日梦》。

<sup>③</sup>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在美学上的应用》，见《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第139页，张唤民 陈伟奇译 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

然，弗洛伊德也意识到了在这一领域的一些重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必须区分开这两类作家：像古代的史诗作家和悲剧作家一样接受现成题材的作家，和似乎是由自己选择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家。我们将要谈的是后一种，并且为了进行比较，我们将不选择那些批评家最为推崇的作家，而选择那些评价不高的长篇小说、传奇文学和短篇小说的作者，他们拥有最广泛、最热忱的男女读者群。”<sup>①</sup>这些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是作者本人愿望的化身，“小说的所有女人总是爱上了主角，这一事实很难看作是现实的描写。但是，作为白日梦的必要成分，它却很容易被理解。同样，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严格地分成好人和坏人，无视现实生活中观察到的人类性格的多样性。‘好人’都是自我的助手，‘坏人’都是自我的敌人和对手，这个自我就变成了故事中的主角。”<sup>②</sup>弗洛伊德所认为的能够体现精神分析学说的一类文学文本，在中国古代的文学文本中，没有比才子佳人小说更为典型的了。

首先，从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来看，他们大都是一些应试落第的读书人，为了发泄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慨，他们借手中笔杆，凭借才子佳人小说以满足自己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愿望。“每当春花秋月之时，不禁淋漓感慨，此其才为何如？徒以贫而在下，无一人知己之怜。……计无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天花藏合刻七才子书》序）“将现实社会不能实现的梦想，转移到小说中才子佳人身上，凭借虚构的故事，实现心灵的发泄，以此自娱自慰。”<sup>③</sup>这与弗洛伊德所说的“在艺术活动中，精神分析学一再把行为看作是想要缓解不满足的愿望”十分一致。

因此在几乎所有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子常会是作品的主角（有时也会是佳人），才子有才貌，因此佳人们都愿意与他结婚<sup>④</sup>，包括那些无才无貌的女人们也都千方百计地想嫁给这个才子。如《情梦栢》中的胡楚卿，不仅小姐爱他，使女袭儿、采绿爱他，最后连沈蕙卿也一起嫁给了他。《玉娇梨》中的苏友白也是让白红玉、卢梦梨都甘愿许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通过以上关于才子佳人小说作者的分析已经知道，其实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才子，往往是屡试不中的下层文人<sup>⑤</sup>，他们不但政治上没有地位，而且经济上也并不富裕。然而自觉熟读诗书的他们，并不甘心低头向下，娶个乡女村妇了此一生；而青春期的情欲骚动，却使他们本能地不能不向往美好的女性。而像《金瓶梅》及其续书那样赤裸裸的发泄本我的欲求，在他们看来是没有文化没有礼教没有诗意的表现。于是，他们的里比多（Libido）欲望就在寻求另外一种不同的升华方式。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考试及第，与一个美丽能诗的佳人合欢，就是他们最大的愿望，其实除了做皇帝之外，“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也是中国男人最大的心愿。那些真正能够考试及第与佳人合欢的文人，在现实中就会实现这一梦想，只有那些屡试不第的下层文人，才会在白日梦——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中实现这一美丽的梦想。

在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小人，无疑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坏人”了。他们或者出于妒忌，或者是自己也想得到佳人，因此他们对才子和佳人的婚事进行极尽阻挠之能事，但是，在才子佳人小说中，小人的阴谋永远都是不能得逞的，他永远要败在以才子和佳人为首的，包括才子和佳人的父母、丫环甚至皇帝为代表的“好人”面前。才子和佳人永远都能战胜磨难，终得爱情。

在得到美妙佳人爱情的同时，才子佳人小说中的男性主人公一般都要考中状

<sup>①</sup> 弗洛伊德《作家与白日梦》，见《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第34页，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

<sup>②</sup> 弗洛伊德《作家与白日梦》，见《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第35页，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

<sup>③</sup> 谢真元《才子佳人模式及其文化意蕴》，《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4辑。

<sup>④</sup> 或者佳人有才貌，才子来求，两人一见钟情，而无才的庸士也想得到佳人，于是就出现冲突，当然最后都是才子得胜。这种安排的深层心理我们在后面将会论及。

<sup>⑤</sup> 这在学术界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见张俊著《清代小说史》第56页。

元，或者通过考中状元，来解决现实中无法解决的一些难题。但实际情况是八股文考试的偶然性是很大的，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考了一辈子却没有及第，现代文豪鲁迅也曾参加科举考试，考得也很不理想。可是，既然考中状元是才子最大的梦想，那么在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子是非考中状元不可的，而且是考得那么轻松，往往连皇帝对他都另眼相看。而在中国古代，虽是一介贫民，考中状元也会鸡犬升天，富贵荣华；不过如果此时佳人才来相爱，往往就很难说是真情，说不定是为贪图富贵荣华而来。因此，在才子的梦中，几乎都是与佳人一见钟情在先，考中状元在后，这样才子的梦想才显得完美无缺。

弗洛伊德说：“在年轻女人的身上，性的愿望占有几乎排除其他愿望的优势，因为她们的野心一般都被性欲的倾向所同化。在年轻男人身上，自私的、野心的愿望与性的愿望共存时，是十分引人注目的。”<sup>①</sup>这在才子佳人小说中也有充分的表现。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才子，在爱恋佳人的同时，还要考取功名，而佳人则一心倾心于才子。这些花容月貌、品德高尚的年轻女子，似乎除了嫁个才子别无所求。而且她们往往也并不计较才子是否爱自己一个，只要才子高兴并且对自己情深如海就够了。才子与佳人都有才华，但是佳人之才就是为了匹配才子的，将来会使婚姻美满而充满诗意，而才子之才却是具有实用性的，是要具有中状元之才，这样才会有功名富贵。

在世的偶然性导致了人生的悲剧性与荒诞性，在一些直面人生的文学文本中，往往能够把人生的悲剧性与荒诞性表现得入木三分。但是才子佳人小说既然是以作家的主观愿望替代了对现实人生的真切表现，那么也就以其与中国文化相适合的必然性取代了偶然性，从而造成了才子佳人小说叙述模式的相似性。可以说，这种叙述模式正是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的一个“白日梦”：才子（小说作者的化身）必然遇到花容月貌、才华横溢的佳人，虽然中间有小人捣乱破坏，但这仅仅是对才子佳人似海深情的考验以及小人自取其辱的过程，因为才子必中状元，甚至皇帝必赏识才子，一切偶然性都是暂时的，最终的大团圆才是小说认定的必然。这种排除偶然性的大团圆之梦，既是作者的内在愿望的表达，也是读者心理上希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要求，而且在一个并不信仰来世与永恒实体的现世民族，最好就是现世现报，所以才子佳人小说的结尾，无一不是恶人遭报应，才子与佳人大团圆。归结起来才子佳人小说中包含着作家这样几个梦想：

## 一、才压群芳的“英雄梦”

由于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大都是一些考试落地的失意文人。而在中国古代，中国文人读书的目的其实就是“学而优则仕”，就是“升官发财”，因此中国古语会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读书的最终目的是升官，为什么要升官呢？升官以后不仅金钱会滚滚而来，漂亮的美人也会不请自来。所以中国古代文人都孜孜以求想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于仕的行列。而要想取得科举考试的成功，其最基本的动作就是读书。由于都想出仕，都想获得富贵荣华、美人相伴，所以读书求名的人就越来越多。因此必定会有读了书，但仍榜上无名的落榜者。而一旦做了落榜者，无疑就等于读了书而白读了。其读书的功能也就失去了。于是光读书还不行，还要有无往而不胜的才能，有了才能的人往往是无所能敌的，就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七十二般变化，上天入地，连太上老君都拿他没有办法）；美国电影中的佐罗（Zorro）（虽然才子佳人中所定义的“才”和孙悟空、佐罗的“才”并不是同等概念上的才）。这些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及第的落榜者们，对此认识的非常清楚透彻，大概他们觉得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不能及

<sup>①</sup> 弗洛伊德《作家与白日梦》，见《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第32页，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

第，不能够升入荣华富贵的行列，除了科举的腐败以外，其主要原因就是自己身上还缺少像作品中的主人公那样的无所不能的“才”吧？因此他们首先就在作品中设计了一个个才华横溢的才子和才女们，并以无才的庸儒及纨绔子弟加以衬托。这些才子和才女们不仅熟通四书五经，有着一般儒生们所具备的一切才能，而且还能诗善赋，出口成章，兼通古今，令时人儒生及那些考试及第的人都望而不及。对才子来说，美女及其家人看重他们的是其才，皇帝大臣们器重他们的也是其才。才成了通向一切的万能钥匙。只有有了这样的才能，他们才可以代替作者以及这些书的读者们打败一个个毫无真才实学的庸人，“救出公主”——获取佳人，并荣登宝座——获取功名，完成其在书中才可以完成的梦想。

有人说这是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不敢正视现实。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弱文人，在用自己仅有的武器而对那个黑暗社会进行消极反抗。作者也清楚地知道对于一个无权无力的文人来说，是不能把那些当权者怎样的，因此只有凭借着自己的笔，而营造出一个战无不胜的才子，在自己的“白日梦”里，让才子用手中的笔来打败那些为官为宦的人，而得到自己精神上的愉悦，以及心理反抗的成功。就像苏友白、双星的胜利一样，其实每个才子的胜利都宛然作者自己的一场胜利，才子们的一次次科场高中，都像是作者本人的一次次科场高中，他们就只有这样可怜地抚慰着自己从科场败下来那颗受伤的心灵，做着自己的“白日梦”，自己取悦自己。所以读才子佳人小说时你多少都能感受到那些落第的文人的悲哀，虽然才子佳人小说是一派和和气气团圆结尾。所以长孙肖应考，虽在无心的情形下，也高中榜眼。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们，眼看着别的人科场及第，高官厚禄，他们羡慕这种众人瞩目，高人一等的生活<sup>①</sup>，但又不愿完全放弃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高及士人的尊严、骨气，于是在小说中就常常会设计一个才子及第，高中状元，皇帝欲求为驸马，或驸马爷、达官显贵欲求其为婿的情节，但才子无视其高位的诱惑，毅然放弃而甘愿与自己属意的佳人结合，通过这种幻觉，实现一个文人凭借其“才”不仅能够见容于社会；同时还能打败“权”“势”，保全知识分子的人格美的理想。在《玉娇梨》中，苏友白不屑于与杨巡抚联姻；《定情人》中，双星也不恋驸马家高枝；《好逑传》中，铁中玉不畏与仇太监的逼婚，其实都是作者借助自己的“白日梦”而表达出的一种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不光如此，其实作品中的佳人也是作者这种“白日梦”精心设计下的一种升华，是作家自恋自赏自我实现的白日梦的一种延续。

## 二、才不逊男的佳人梦（有才有貌的佳人梦）

才子佳人小说打破了以往中国人观念中“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同时又“无才便是德”的传统妇女观，创造出了一个个才貌双全、才智双全的佳人形象。这个佳人除了容貌美丽以外，尤其是其才能与才子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时候，才子在她们的面前也会捉襟见肘，才不能及。这是与传统的以描写才子和佳人为主题的郎才女貌式的婚恋小说所不同的地方。

《定情人》中的江蕊珠六、七岁时便容光如洗，聪慧非凡，一教便知。十一、二岁文章俱做得可观，而诗词出口皆有惊人之句。若有女科试才，定能取得女状元。《玉娇梨》中的白红玉也“生得姿色非常”，“更兼性情聪慧，到八、九岁，便学得女工针黹件件过人。”“到得十四、五时，便知书能文，经已成一个女学士。”《平山

<sup>①</sup> 这从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为才子和佳人们所安排的出身便可以看出来。他们一般均是名门或官宦之后，只是因为父母亡故，或者无心于官场、为官清廉、隐归故里，才变得不是当权者一簇。如：苏友白是苏子瞻之后；双星的父亲也曾做至礼部侍郎；铁中玉的父亲也是进士出身，官居御史；胡楚卿的父亲也曾官至礼部郎中等等。

冷燕》中，山黛十岁做诗即压倒满朝文武。

所以，在才子佳人小说中，不仅才子们通过其才，可以达到其目标，完成其理想；佳人如果有才，也同样可以改变其命运，免受侍女之遇。因此在中国的小说史上，可以说才子佳人小说是第一个把女人和男人放在同一平等的地位上来看待的。因此，单从这一点来看，才子佳人小说也有不能抹煞的积极意义。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真正能算作才女的女子其实寥寥无几，他们强调三从四德，强调女子无才便是德。而在才子佳人小说中，一下子就冒出了这么多。并且她们的“才”，比男子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方面与作者企图打破中国固有的男女格局，弘扬女性的地位有关；另一方面，当然还要归结到作者的“白日梦”谈起。

前边的论述中，我们曾经一再提到过，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们，大都是些落第的文人们。他们极希望自己的所谓“才”能够被社会认识，并被社会所用，并使自己一颗受伤的心灵得到安抚。所以，他们在作品中安排每个才子及第，在这个及第梦中使自己一颗破碎的心得到修复。而在中国古代文人的最高理想中，“金榜题名时”是和“洞房花烛夜”同步进行的，而缺少其一都是不圆满的。因此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除了给才子以无限的才情，使他能打败一切腐儒，榜上有名的同时，还要幻想出一位貌美的佳人与之为配，才能使其文人的最高理想得以实现。而一般的徒具美貌的佳人显然与作者知音以求的理想相差太远，所以他必须幻化出一个有才貌的佳人，才能配得上一个战无不胜的才子之才。在早期很多才子佳人小说中，其实男情女爱的主题，常常已被才才相吸、才才相悦的主题所代替了。才子追求佳人的过程也常常变成了一个才被欣赏，才遇知音的一个过程。在此我们不妨再援引一下天花藏主人在《天花藏合刻七才子书序》中的话以做说明。他说“天赋人以性，虽贤愚不一，而忠孝节义莫不皆备，独才情则有得有不得焉”，然而“独是天地既生是人矣，而是人又笃志诗书，精心翰墨，不负天地所生矣，则吐辞宜为世惜，下笔当使人怜，纵福薄时屯，不能羽仪廊庙，为凤为麟，亦可诗酒江湖，为花为柳。奈何青云未附，彩笔并白头低垂；狗监不逢，上林与长扬高阁，即万言倚马，止可覆瓿，《道德》五千，惟堪糊壁”。所以“每当春花秋月之时，不禁淋漓感慨，此其才为何如？徒以贫而在下，无一人知己之怜。不幸憔悴以死，抱九原埋没之痛，岂不悲哉！”所以，天花藏主人继续慨叹“顾时命不伦，即间掷金声，时裁五色，而过者罔闻罔见，淹忽老矣。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诟无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若然，则天地生才之意与古今爱才之心不少慰乎！”<sup>①</sup>这段话很清楚地道明了即使有才后，怀才不遇，知音难求，才不被赏，才不被用时内心的极度痛苦。作者自己也说明了，他写小说的目的是借乌有黄粱之梦，来抒发自己的忧愤之思。使“天地生才之意与古今爱才之心”得到安慰。所以在某些才子佳人小说的作家那里，写出一个“充溢着脂粉气的香艳故事”已并非其本意，“以小说为才人吐气”，抒发“期待知音之忱”，才是其目的所在。<sup>②</sup>因此，在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眼里，才子追求佳人的过程，也就幻化成了才终被赏知音终遇的一个过程——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像《玉娇梨》、《平山冷燕》、《玉支玠》等作品仅凭一两首诗便产生了爱情不足为奇了。而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也会常常不自觉的发生角色转移的幻化。才子追求佳人的过程，也不单是一个男人追求女人的过程，而包含了一个才人，追求另一个才人的过程；而佳人被才子追求的过程，也不单是女人被男人追求的过程，而包含了才终被发现，才终被追求的过程。所以，在这些

<sup>①</sup> 天花藏主人《天花藏合刻七才子书序》见《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 第31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

<sup>②</sup> 参见陈文新等著《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第182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品中，作者有时候被幻化成了才子；有时候又被幻化成了佳人。才子战胜庸儒获取佳人，是作者之才胜利的一种愉悦；佳人被一群男人追求，佳人对才子之才形成一种威胁，也是作者之才胜利的一种愉悦。作者就在他幻化出来的双向的胜利中，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使“天地生才之意与古今爱才之心”的白日梦得到实现。而欲使这美好的梦想得到顺利完美地实现的话，作者还必须在梦中设计出一个保证这梦境成功的一个环节，那就是“人人爱才”的才人梦。

### 三、人人爱才的才人梦

现实生活中，才子的才往往是并不一定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不为君所重用后来被上升为一种“美人芳草”主题，而被扼杀的天才更是比比皆是。中国的大圣人孔子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一部《论语》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成为历代中国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楷模，不谓无才。但孔子一生却是在郁郁不得志，颠沛流离中度过的。虽然他极力声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sup>①</sup>，但仍过着不被理睬的生活。只好驾着他那辆马车到处游走，把头发由黑游白，还处处受人排挤，甚至还曾一度在狱中度过了五年艰难的时光。大诗人屈原多才，虽曾任三闾大夫短暂风光一度，但他的才能并没有得到楚怀王的重用，其结果却是落得自投汨罗江而死；蒲松龄一部《聊斋志异》，享誉海内外，不谓无才，但却一生科举，终未及第。著名大画家梵高生前也是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而被称为“歌曲之王”的舒伯特，生前过得不仅穷困潦倒，甚至连他所爱的姑娘也因为他穷而离开他嫁给了一个富商。在中外历史上，怀才不遇，有才并不被赏的有才之士比比皆是。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也曾说过“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皆全力死之”。<sup>②</sup>指出天才常常是不被接纳，或不受欢迎的。但在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才子却一改历史上天才们所遭受的冷遇，不管是才子还是才女，不管他走到哪里，都会得到一帮“追才族”的追捧，其盛况并不亚于如今的歌星面对其歌迷。当然，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可能成为事实，它仍只不过是作者安排其主人公能够被社会承认，顺利取得功名，打败小人，得到佳人白日梦的一个步骤，是其才子梦实现中的又一个黄粱梦而已。

这首先从佳人家的择婿观中便可窥见一斑。《玉娇梨》中，白玄为红玉择婿的条件就是“有才有貌”，其他诸如名利地位并不在考虑之列，为了得到这个“有才有貌”的才子，他不惜得罪当权御史，不惜跑到西湖等地每日去寻找。在《玉支玏》中，管灰爱惜长孙肖，并不嫌弃他家贫的理由也是“人生天地，第患无才。眼前贫贱，安得限人”。后来果然把他召为管彤秀的女婿；《定情人》中，江章见蕊珠长成，“每每留心择婿，必欲得才子配之方快”；《好逑传》中，水居一之所以一心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铁中玉，也是因为“有意选才”，听说铁中玉“举动行事，大是可观”，及至当面见到后，铁中玉又经史文章，孙吴韬略无所不通，且“论伦常则名教真传；论治化则经纶实际，莫不津津有味，凿凿可行”；《情梦析》中虽然没有明确说要召个有才之士，但沈夫人与沈长卿商议给沈若素找一个什么样的夫婿时也指出“门楼好，不如对头好，效苏小妹故事，令女儿出题选诗择婿”，这哪里是择婿，明明是择才啊。

佳人们自己也是崇尚嫁给一个有才有貌的才子的，有的甚至立誓非这样的才子不嫁。而佳人及其父母们对才子的这种热爱，其实也取决于作者所幻想出来的那个社会对才子们的热爱。试想一下，如果像才子佳人小说的这种爱才的理想能够实现

<sup>①</sup> 《论语·子路第十三》

<sup>②</sup> 见《鲁迅全集》第1卷 第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的话，那么该有多少悲剧未曾发生过呀！如果齐景公和鲁定公爱才，并能大胆地采取孔子的建议，那么，孔子的理想也许就已经实现，孔子在有生之年也许就不会有“乘桴浮于海”的感叹，也就不必带着颜回、子路等去周游列国，碰得一鼻子灰回来了。三闾大夫屈原也就不会有被小人所害自投汨罗江的遗憾。如果人人爱才，才才相赏，而不是相妒，韩非、周瑜、孙臧等也就不会无辜而死，许多悲剧也就不会发生。那样的话大概真会出现一个像才子佳人小说作者所描绘出来的，充满和谐与美好的一个社会局面。但无奈的是，悲剧在发生，人们的贪婪自私嫉妒的本性在暴露并发挥着效应。在中国文坛上从宋明以后，下至于清，中国文人们实际上各树门派，成为一种群体的文人相轻，他们各以所长，攻其所短。而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却并不管这些，他自顾自地在作品中一味地营造着自己想象的爱才社会，做着自己的才人梦。他们并没在意曹雪芹的“编得连影儿也没有了”，也不在乎鲁迅等称之为“说谎的文学”，互相骗骗的文学，他们自顾自地继续构筑着自己的白日梦，以至于做出了七十多部类型化的小说。这不能不从作者和读者的深层心理来认识一下。

对这种白日梦幻，我们如果仔细推敲一下的话，也会发现这种才人梦的幻化，其实体现了作者企图打破自古以来文人相轻，才才相妒的格局。他不希望或者说不忍心看到那种才人相残甚至连亲兄弟都不认的历史悲剧，而设想出来了这样一个人人爱才，因才相爱，才才相吸的乌托邦社会，企图以此唤醒人体内善的因子，使整个社会能够重归于像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一个处处充满着爱惜才人，论才行赏的公平社会。所以，在才子佳人小说中，在作者所极力弘扬的才子和佳人中，我们完全看不到孙臧与庞涓、李斯与韩非、曹丕与曹植、周瑜与诸葛亮这些嫉贤妒能，兄弟相残的残酷一面，代之而起的是一幅和乐融融，惺惺相吸的优美画面。在这些作品中，嫉贤妒能的性格特征，只有小人才有。但另一方面，没有才的小人，反过来对才却也是趋之若鹜，百分敬慕的。到作品的末尾，这些小人也往往都会被才子们的高尚品格所感染，而改邪归正，变为能向才子靠拢的准君子类人物。有人说这种和乐融融的大团圆结局，反映了作者不能正视现实的软弱，鲁迅并称之为“说谎的文学”。其实，这种尚才崇才的主题，并不是才子佳人小说作者的独创。我们仔细阅读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在明末清初的小说中，这种尚才主题已经十分鲜明。《三国演义》虽写出了魏蜀吴三国的争权夺利，但也突出地表现出了“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人才宝贵的强烈的人才观念。刘备与诸葛亮三顾茅庐的故事自不必说，就连曹操也是一个爱才、惜才、善于罗致人才的典范。他宴饮长江，以“山不在高，水不厌深”自比，抒发了自己礼贤纳士的博大胸怀，并希望越来越多的有才之士归属自己。攻克冀州后，他令人遍访冀州贤士，得崔琰；更为可贵的是他的爱才心理甚至能延及到对敌人阵营中人才的珍惜和喜爱，如作品中描写他见许褚“威风凛凛”就心中暗喜，见徐晃“威风凛凛，暗中承奇”，见贾诩“应对如流，深爱之”，并想方设法争取过来为己所用。而他对关羽的礼遇故事，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称赞的爱才典范。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雄才大略的诸葛亮后才气象日新，胜赤壁，夺荆州，取西川，定汉中，乃至称王称帝，盛极一时。所以说一部《三国演义》虽然描写了魏蜀吴三国的历史、战争，但也突出地突出了一个爱才、惜才、选才、用才的重要性。被称为英雄传奇小说的《水浒传》更是描写了一百单八个各有所能，充满才气的英雄故事。其中所极力推崇的人物宋江不仅“义胆包天，忠肝盖地”，更兼“仗义疏财、大度爱才、知人善任”。在《水浒传》的一百单八将中，论武艺和勇敢，梁山一百多条好汉可说大都在宋江之上；即使比谋略，不少人也远胜于他。可是偏偏宋江能稳坐第一把交椅，成为独一无二的领袖，就是因为他的爱才惜才护才用才。他与心胸阴狭的白衣秀士王伦成一鲜明对照，王伦是千方百计地妒才拒才，宋江却是不顾一

切地爱才纳贤。而同期的另一部小说《西游记》虽描写了唐僧师徒四人历经磨难，去西天取经的艰难历程，但其爱才、弘才的思想也表露的十分明显。在师徒四人中，孙悟空无疑是作者所极力推崇描写的对象，也是最有才能的一个。他一出世便“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牛”，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并七十二般变化，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他可以把“圣洁”的天庭打得稀里哗啦，掌人生死的阎罗也要对他卑躬屈膝，威武勇猛的天兵天将在他面前失败得很狼狈，至于人间的帝王将相更是毫无尊严可言。而作品中的另一个人物猪八戒与孙悟空相比，显然常处于被嘲笑的境地，这除了其形象及性格的原因外，作者所赋予其的才能也显然逊于孙悟空，如虽然他也能三十六般变化，但总没有孙悟空变得好，不是太胖，就是太丑。虽也能冲锋陷阵，但常常被打得败下阵来，最后要由孙悟空来收拾残局。读完《西游记》的人显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如果取经路上，少了这个才能超常的孙悟空，师徒四人恐怕寸步难行，唐僧恐怕早就落在虎口，更何谈取得经文，修成正果。

在明清之际，这种对个人才能的突出及强调，代表了中国文坛上描写对象由类型化到突出个人才能的一个转化。而处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伟大作品之后的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显然曾受到了这些书中人才观念的影响，但由于其作者本身生活面的狭小，以及眼界的不够开扩。因此，到才子佳人小说中，人才观念便完全一变，局限在了才子的能吟诗作赋，挥毫弄墨，科场及第上。不过，作者有时候也想突破这种局限，赋予才子们更多的才能。如写双星不仅能够赢得考场，还能成功出使他国，修好两国关系。而铁中玉除了天资高，学问能出人头地的文才以外，还有能挥动两把铜锤的武才。不过作为才子佳人小说作者独创的是，他把这种对才能的强调和热爱，还延及到了女人身上，活灵活现地塑造出了这一个个才不让男的才女形象。而在中国几千年来的男权社会中，女子们实际上只在履行着相夫教子，繁衍后代的简单职能。而男人们结婚的目的也只不过是为了传宗接代，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对于女子的能力、才能，尤其是咏诗吟赋的能力并不在乎，翻开中国文学史，能够垂古留名的也只不过有李清照一个而已。而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一下子就打破了这个格局，他在小说中不仅塑造了一个个才不让男的才女，更重要的是，除了才子以外，即使是那些不学无术的庸人假才子们，其最高理想也是找一个有才有貌的佳人为配。这与传统的婚姻观是大大不同的。

#### 四、邪不压正的正义梦

我们之所以把这种人人爱才的内容也列为作者的白日梦之一，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才而能各尽其能的人有之，而有才但终不被用的人也大有人在。如前面谈到的孔子、屈原等等。而有时候不光是有才而终不能被用，常常还是有才而遭人嫉妒、遭人诽谤、遭人诬陷，正义被邪恶掩盖的例子数不胜数。如果不是上官大夫、郑秀等人的陷害，一身才气，正直忠言直谏的屈原不会绝望到死，屈原的死是正义之士对卑鄙的小人所表示出的无声的悲壮的抗争。如果正义永远能够战胜邪恶，卑鄙的嫉妒心不在李斯的心理作怪，那么韩非子也不会冤死在狱中。这就是血的现实，是一个残酷的现实。而在才子佳人小说中，这种残酷的现实被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薄纱，这些小人费尽心机，虽极尽破坏之能事，但常常都会在阳光下暴露，其阴谋都会被才子击破，或不攻自破。因此读者在读完这些作品的时候，都会长长的呼一口气，有一种正义终被伸张的快感。这与弗洛伊德“在艺术活动中，精神分析学一再把行为看作是想要缓解不满足的愿望——这首先体现在创造性艺术家本人身上，继而体现在听众和观众身上”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同时，在才子佳人小说中，甚至在人物的分配上，也和弗洛伊德对他所论述的文本完全接近“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严格地分成好人和坏人”。在这个好人和坏人的两大阵营中，好人永远会胜利，坏人永

远会失败。

这一点《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也曾给予过评判，他说“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的小丑一般”。并对才子佳人小说大加诋毁。曹雪芹的确道出了才子佳人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每部作品中我们几乎都能找到一至两个，甚至更多的小人穿插在代表正义的才子和佳人之间，成为才子求取功名和佳人路上的绊脚石，他们或无才无德，或嫉妒心强；弄虚作假，栽赃枉法；他们无视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滥用职权，能借机把影响他们阴谋的才子无辜派往他国或戍守边疆，也能生拉硬抢，恬不知耻。总之，他们极尽破坏之能事，和历史上的陷害正义之士的小人没有什么区别。

这显示了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并不完全像曹雪芹等人所认为的一味的生编硬造。他已清楚地认识到了在现实生活中，小人和坏人的作用和猖狂，有时候他就是这些小人和坏人手下的受害者，因此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在写到这些小人和坏人的时候从相貌到行为都是用一种嘲弄的手笔来写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不管作品中的情节怎样发展，才子佳人小说中的这个小人物——有时是坏人都会以失败告终。正义永远战胜邪恶，光明永远取代黑暗。对这一特点，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不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因为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论述的那样，在现实生活中，才不见赏，小人得志，草菅忠良的例子数不胜数。屈原就是一个正不压邪，小人得志的典型例子。它清楚地表明了其不过是作家白日梦的更进一步的延伸。是作者一个崇高的正义的理想。以《好逑传》为例，可列为小人或坏人的有水运、大夫侯、过公子、知县、和尚、按院冯瀛以及仇太监、御史万谔。而贯穿始终的是水运，由水运带出来了一系列带有劣根性的与才子的高尚人品形成反照的小人。这些人都被人性中的恶的欲望所支配，不是嫉妒，就是贪钱贪色。在这种恶欲的支配下，他们做出了一系列违背才子佳人作者意愿的，不合乎道德规范的事情。

在《玉娇梨》中，构成情节发展，并使苏友白和白红玉之间的婚事出现障碍的，也是因为杨御史、张轨如、苏有德等几个小人的接连出现。不过，随着情节的发展，这些小人也照样一塌糊涂地败在了才子和佳人们的面前。

如：《平山冷燕》中的假才子宋信、张寅；《定情人》中贪才好色的宦家子弟赫炎；《玉支玏》中的强之良和卜成仁；《情梦栢》中的庠公子；《宛如约》中的晏名黻和李吏部等。他们是生活中的身边的普通人，他们有着普通人所有的劣根性如：贪、懒、嗔、痴，他们好色，喜欢钱财，他们会嫉妒、会报复。因而，在作品中，他们一连串的恶行也都是在这种恶性的敦促下释放出来的。而才子和佳人，他们一方面本身便具备较好的人格素质，同时，他们喜好读书，从诗书中，他们又得到了较好的人格修炼。因此，他们能更多地去去除人性中的恶质，坦坦荡荡。才子佳人虽处一室，而毫无所犯；虽同赴考，而毫无所嫉。也许正是作者所设想出来的这种完美的人格，使带有人类更多劣根性的小人们总是轻而易举地败在了代表正义一方的才子和佳人的面前。这种失败，与其说是某几个小人的失败，毋宁说是作者所不齿的一类人的人格失败。是作者所设想的一种理想社会的理想人格的胜利。

## 五、和谐美好的团圆梦

才子佳人小说从其产生的时候开始便遭到了人们的攻击，理由主要有三：其一是才子佳人小说所描述的男欢女爱的婚恋主题，有伤于道德风化，与中国传统中所形成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模式相背离；其二是才子佳人小说中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一见钟情，小人拨乱期间的结构模式；其三就是才子佳人小说所呈现出的花好月圆、祥和美好的团圆结尾。的确，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所有才子佳人小说中，

无一不是沿用着同样的一种结构模式：那就是坏人终于得惩，才子和佳人经过艰难曲折终得团圆，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并且妻妾也都生子生女，子女也都很有出息，功名有成。但他们不慕功名，往往挂职而去，过着神仙般逍遥自在的生活。就像安徒生童话中的白雪公主和王子一样，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只要看看每部小说的结尾便可一目了然。

我们已经知道才子佳人小说是继《金瓶梅》以后，真正的文人自创小说，他的作者，也都是些生不得志的落第文人。这部分人饱读诗书，从小就在四书五经的陪伴下长大，因此，他们已经饱受礼教的浸泡，和儒家思想的影响，是传统的中国式的知识分子，深受传统古典主义美学思潮的熏陶。而传统的中国文化讲究“礼”，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克己复礼为仁”，讲究“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讲究“中庸”。反对矛盾的两端对立冲突，要人安分守己，“君子思不出其位”。致力于矛盾的两端的调和与中和，使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群体、物与我、理想与现实合而为一；强调“人与自然、物与我、再现与表现、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结合”<sup>①</sup>，而不是发生冲突与对立，极力追求一种中和之美。“试图把天下国家搞成一个无不平、无烦恼的和乐盈盈的大家庭”<sup>②</sup>。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们自小就浸润于这个大文化圈中，他们希求“和谐”，希求“美好”，他们并不想打破儒家梦中的“和谐”的乌托邦，“不肯让冲突由对立导致破裂和毁灭”。然而现实并不如此，现实的缺陷已经对他们久已形成的“和谐”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威胁，他们的应考落第就给从小形成的和谐之梦画上了一笔最不和谐的音符。这是作者们所不能接受，也不愿承受的打击。但自我标榜“名教中人”的才子佳人小说作者并不想让自己的个体从群体中分离，使得主体与客体处于对立冲突状态，或者以其理想来否定现实。他们不想承受这份打击，而又不得不面对这有缺陷的现实。于是，他们就在这艰难的矛盾中，企图营造出一个自己意义上的、想象中的完美和谐社会。宁愿借助手中的那杆笔，来重新营造出一份“和谐”，一份“温柔敦厚”的乐土。在梦中借团圆来完成自己梦寐以求的美好和谐之美，得到心灵上的桃花源。而“大团圆”无疑是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合一的最典型的表现，是儒家“温柔敦厚”诗教与中和之美的理想的最集中的体现。

其实，不光在作品的结尾处理上，在人物处理的时候，作者所企图体现的也是这种团圆和谐之美的创作理想。因此，他不单给了他笔下的才子和佳人以无限的超出常人的才情，给一个才子必然有一个或者更多的佳人与之相配，给一个佳人必然能跟其他佳人和谐相处外，还首先给了他们一个几乎是近于完美的外形。使他们一出场便给这个和谐美好的理想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每个才子和佳人，几乎都可以构成一个和谐美好的代言体。不管你读哪一部才子佳人小说你都会发现：单从才子和佳人的形貌上，就可以感觉到作者对这种和谐美好的热切追求。他们无不是“明眸皓齿，玉润金辉”“琼姿玉骨”“俊俏风流”“风姿俊秀”；而佳人呢也都是“双眉春柳，一貌秋花，柔弱轻盈，”“天姿国色”，“亭亭仙子初临洛，愁人一顾魂消却”，恰如“蓬莱仙子，谪降尘凡”“眉目秀美，如仙子一般”。为什么会说如“仙子临洛”“蓬莱仙子，谪降尘凡”“如仙子一般”呢？因为，世间的一切总是难以完美的，比如一个人脸长得好看，就可能会鼻子矮了一点；鼻子长得好看，就可能身材胖了一点；身材长得好看也许会皮肤黑了一点，只有神仙是超出六道轮回三界之外逍遥自在的完美载体，因此，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为了表达自己那种希求和谐美好的梦想，就搬出仙子来作比，以期把自己笔下的

<sup>①</sup> 周来祥《美学问题论稿》第39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sup>②</sup> 高旭东《文化伟人与文化冲突》第7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人物塑造成一个和谐完美好得不能再好，美得不能再美的人物。

当然，或许有人会说在才子佳人小说中其实也充满着缺陷，充满着不和谐：如很多才子都是从小就失去双亲或双亲中的一个；如才子佳人小说中都有一个如跳梁小丑时的小人等等。在以上的论述中我们说过，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们就生活在现实中，残酷的现实常会给他们美丽的梦想泼上一些冷水，使他们美丽和谐的梦想变得不太美丽不太和谐，如最现实的应试落第，个人志向的不能实现，考试中的腐败等等，当然可能还会有更多，这是作者们所必需面对而又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那种想象中的完全的和谐美好实际上不能存在。作者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在作品中也就故意地设置了一些小小的不和谐，不美好的细节，如在写才子和佳人的才能和美貌的时候，常常又会写到他们自小失去双亲或单亲，企图给这种和谐美好加上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以使他们显得更接近生活，加强故事的更可信用度。如《玉娇梨》中，白红玉十一岁上母亲就亡故了，苏友白呢，虽是苏子瞻的后代，但父亲在他十三岁时也已亡故，只有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另一位佳人卢梦梨也是没有父亲只有老母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美中不足。《平山冷燕》中的山黛和冷绛雪倒是父母俱在，但才子平如衡和燕白颌却都是父母双亡了的。《定情人》中的双星三岁上，就没了父亲。《玉支玑》中的长孙无忝父亲早亡，管彤秀也母亲早丧。《情梦栢》中胡楚卿十五岁上父母相继而亡。《两交婚》中甘颐、甘梦也是靠母亲来抚养，父亲早已殁了。

除此之外，作者还在故事中给主人公设置了一个更大的不和谐，那就是一定让一个小人或坏人出来给才子佳人捣乱。在作者看来，生活中之所以会出现烦恼，出现痛苦，全是因为这些不和谐、不美好构成的。这些小人或者说坏人，无疑就成了作者实现其和谐美好梦想路上的绊脚石。于是，作者在写这些小人时，与才子佳人们相反，首先就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十分不和谐的外表，继而安排了对和谐形成对立的行为。如在前边我们曾提到过的对水运形象的描写，对张轨如的描写。其实在每部才子佳人小说中对小人的描写沿用的都是这样一种模式。如《平山冷燕》中，晏文物“眇一目，跛一足”，宋信呢，“为人轻薄，心下不畅”，张寅又是“肥头胖耳，满脸短须，又矮又丑”。《情梦栢》中的库公子是个“麻胡子”，“每逢月夕花朝，那一处妇女不看过？”。《定情人》中的赫炎倒是“生得人物魁伟，情性豪华”，但却“挥金如土”，“终日在外架鹰放犬的打围，或在花丛中作乐，日则饮酒食肉，夜则宿妓眠娼，除此并无别事”。《玉娇梨》中的另一个小人杨御史，“为人言语粗鄙，外好滥交，内多贪忌，又要强作解事，往往取人憎恶”。基于此，他们当然不会在作品中做一个和谐的音符了，在作品中，他们无论礼仪，不讲道德，他们完全背离儒家的“温柔敦厚”，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等行为准则，在才子和佳人走向和谐美好的路上描画着极不和谐的音符。但更多的是作者根本不愿意去触及更多的黑暗，更多的冲突，更多的不和谐。作者实在太留恋他在观念中所形成的那个充满温情的，和乐的，以礼相待，温柔敦厚的和谐美好的社会了，他根本不愿让一个充满了争斗嫉妒勾心斗角的社会展现在人们或者说读者面前，那对自己所形成的和谐社会是一种无情的冲击，也和儒家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教传统不符合。于是，他写这些看似丑，看似恶，看似不和谐的东西，实际上是为了更突出他在作品中所要极力提倡和表达的和谐与美好。这从作者对这些小人态度，和以后他们都能改好从善的处理上便可以感觉出来。面对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冲击，面对淫乐注重肉体享乐之风的泛滥，作者感到痛心，他太怀恋自汉代以来一直占有中国思想文化统治地位的儒家温柔敦厚，仁、义、礼、智、信的社会了，他不愿意让一股资本主义思潮，一个李贽，一个三阮把中国搞成一部部的《金

瓶梅》。于是，他要拿起笔，一方面排遣他久试不第，不为人所知的郁结；另一方面，他要靠手中的笔担负起教化的作用。因此，在很多作品中，因为小人的这种不和谐，反而使作品中的才子和佳人变得更加和谐。如《玉娇梨》中，如果没有张归如的以假欺真调包计，苏友白就没有机会去认识另一位佳人卢梦梨，而卢梦梨也就没有机会和白红玉和谐相处，娥皇女瑛共处一室，相亲相爱共侍一夫。同样《平山冷燕》中如果不是宋信的嫉贤妒能官报私仇，也就不会有冷绛雪进京认识山黛，两美和谐。《玉支玑》中卜成仁的捣乱才引出了才女卜红丝。所以说，作品中的这种不和谐都是为了一个大的总和谐服务的。而作品中所宣扬的和谐美好又会影响到读者，众人效法，便会形成一个像作者所设想的温柔敦厚，礼义仁爱的理想社会。所以，作者在这些小人经过一些无关痛痒的表演后，都给他们一个温情的惩罚，或者使他们改恶从善，无一例外地让才子和佳人终获团圆，得到最终意义上的完美与和谐与美好。使作者的美学观念得以完成。所以在《好逑传》中，铁中玉和水冰心不仅得到了清白，还得到了堂堂正正的团圆。《玉娇梨》中苏友白不仅得到了佳人白红玉，还娶了另一位佳人卢梦梨。《定情人》中双星经过艰难险阻终于与自己喜欢的人定情。《玉支玑》中长孙无忝也成就了与两位美人的和谐姻缘。不光如此，作者还让他们的后代都登了科甲，成了功名，为和谐画上最后的完美的一笔。一部小说完成了，作者梦寐以求的那个梦想社会也完成了。这就是才子佳人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的作家。

（作者简介：张淑贤，1963年生，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副教授，韩国启明大学孔子学院副院长，电子信箱：[zhshx2001cn@yahoo.com.cn](mailto:zhshx2001cn@yahoo.com.cn)）